

■ 名家语丝 WORDS FROM THE CELEBRITY



天地人师，敬畏敬畏之人，好奇好奇之事。置思想于天上，入双脚于泥里。学可学之师，教可教之人。思可思之题，寻可寻之路。胸怀理想，脚踏实地，寻思社会之真理，探究华夏之大道。是以为治学之座右铭。



做社会之社会研究 寻三农之三农之路

——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雷明教授访谈

雷明,王钰晴,刘晴晴

摘要：“做社会之社会研究，寻三农之三农之路”访谈中，雷明教授主要围绕贫困治理、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话题讲述了三农问题学术研究之路和要旨。在他看来，人才问题是乡村振兴的元问题，应当塑造乡村人才的可持续能力，实现造血式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建设“和美乡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当坚持“两山”理念，既要“百姓富”也要“生态美”，既要美丽经济也要美丽生态。共同富裕战略下，亟需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应加快构建以初次分配为基础、以再分配为重要补充、充分发挥三次和四次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同时也要打造城乡联合共生体。

关键词：贫困治理；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二元结构；连体共生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24)01-0003-06

雷明，英国爱丁堡大学荣誉教授(Honorary Professor of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原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原扶贫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本科学士、研究生硕士，中国人民大学中美研究生班，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后站首位博士后(国家博士后)，师从厉以宁先生。新疆财经大学天池特聘教授，贵州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云南省科技战略专家、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客座教授、贵州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西北农林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Kyoto University) KANSEI POWER 讲座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of Donated Chair)，京都大学客座教授(Kyoto University Visiting Professor)，香港中文大学黄宽诚基金讲座教授，美国西北(Northwestern University)大学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美国曼隆学院(Menlo College)访问教授(Visiting Professor)等。

收稿日期：2023-01-16

作者简介：雷明(1965-)，河南上蔡人，新疆财经大学“天池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二级教授，英国爱丁堡大学荣誉教授(Honorary Professor of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北京市乡村振兴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原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王钰晴(1998-)女，山东德州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刘晴晴(1992-)，女，湖南邵阳人，《社会科学家》杂志社编辑，研究方向为编辑学、社会治理、公共政策。

担任中国环境科学协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统计局、中国国家林业局和国家统计局“绿色 GDP 核算”联合攻关项目组专家,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加统计信息管理项目(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运筹学会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国际决策科学协会(Decision Sciences Institute, DSI)亚太地区决策科学协会(Asia Pacific DSI)当选主席(President elect)等。

目前研究方向包括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乡村建设、生态乡村、贫困与可持续减贫、决策分析与机制设计、区域可持续发展、绿色国民核算与统计、资源能源环境绿色管理等。目前在 Omeg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Energy Policy,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等国际 SCI/SSCI 以及 CSSCI 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两百余篇,出版中英文学术专著多部。先后应邀在 Nature、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半月谈》、中央电视台一套、中央电视台二套、凤凰卫视等重要媒体就相关问题接受专访和发表论点。曾担任多个重大国际会议分会主席和特邀评论员及共同主席。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北京市社科基金等部委及地方项目如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林业局、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西藏扶贫办,贵州扶贫办以及欧盟、BHG 国际项目等。

主要代表性著作有:Climat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in China: Policy, Technology and Market (Springer, 2022),《振兴之路:新阶段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绿色发展与生态减贫》《迈向共同富裕:中国扶贫的实践选择》《通往富裕之路:中国扶贫的理论思考》《中国扶贫》《股田中国——兼论农村股份合作制》《贫困与贫困治理——来自中国的实践(1978-2018)》《新型城镇化与减贫发展》《旌德调查——关于安徽省旌德县多元扶贫的调查报告》《农村信息化模式选择与路径依赖——广东德庆县农村信息化调查与分析》《贫困山区可持续发展之路——基于云南昭通地区调查研究》《科学发展 构建和谐——贵州省毕节地区开发扶贫与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下绿色核算——资源经济环境综合核算》《绿色投入产出核算——理论与应用》《中国资源经济环境绿色核算(1992-2002)》《中国资源经济环境绿色核算综合分析(1992-2002)》、Fair Development in China: 12, Fair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a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Ecology in China (Springer, 2016)、Green GDP Estimates in China, Indonesia, and Japan: An Application of the UN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 Chapter 6: SEEA & Green GDP for China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0)、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amework, Chapter 3: The Estimate of the China's Green GDP in 1992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9)等。

先后获英国爱丁堡大学荣誉教授,全国优秀博士后称号,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中国绿色人物特别奖,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环境奖,国家教学二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一等奖、二等奖,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一等奖、二等奖,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研究报告一等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三等奖,全国统计科技进步奖论文二等奖,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创新奖一等奖、国网软科学科技进步二等奖,日本筮川良一优秀青年奖、中国光大环保优秀论文一等奖、二等奖等。

王钰晴、刘晴晴(以下简称“王、刘”):雷教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社会科学家》杂志社的学术访谈!作为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的院长,您一直十分关注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问题,也取得了许多的研究成果。您能谈一谈乡村振兴的战略意义和内涵吗?

雷明(以下简称“雷”):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我认为乡村振兴的内涵可以从其服务对象、价值指向以及核心要义三个角度来理解。

一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服务对象是“乡村”。在中国,乡村是具有行政区划意义的空间概念,不仅代指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 and 经济体,更内含着血缘关系和邻里关系,有着共同的风俗习惯、文化和价值体系,是集生活与生产、社会与文化、历史与环境多元要素为一体的人类文明体。服务乡村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乡村为我国早期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从农业的基础地位来说,农业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农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从农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说,我国人口众多,粮食的自给能力不止关系着国民经济,更关系着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从乡村的重大意义来说,乡村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关系着亿万乡村人口的幸福,关系着国家能否继城镇化推动发展之后,背靠

乡村打造持续增长的引擎,进行新旧动能转化,持续推进高质量工业化、信息化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指向在“振兴”。“振兴”从时间维度上讲是“三农”工作的延续和强化,从空间维度上讲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同发展、增强全球竞争力。从时间维度来看,“振兴”蕴含的思想、洞见和判断早在多年来的“三农”工作中就有所孕育和形成,对乡村“振兴”的目标和导向也一脉相承。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视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1982—1986年连续5年、2004—2020年连续17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党在不同时期的乡村政策之间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从空间维度来看,乡村并非孤立的存在,而要置于空间维度下与其他区域形成互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振兴”是城乡之间的协同发展、共建现代化,也是全球视野下的创新突破、全面复兴。城乡维度上,“振兴”要实现城乡差距缩小、城乡融合发展。城市和乡村都是文明的载体,城乡等值互补,而非用城市代替乡村、实现全盘城镇化。全球维度上,“振兴”是置于全球治理体系的整体格局中、用以提升国际竞争力、提高国际地位的重大战略选择。

三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义在“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对“三农”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新目标的重大判断、重大决策,这有别于以往任何一个农业农村发展政策,是一个宏观的、系统的、综合性、全局性的发展战略。在战略高度方面,乡村振兴是关于乡村未来发展过程中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问题的谋划,着眼全局、立足长远、面向多维,是党在农业农村发展理念和实践上的一个重大飞跃,为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可遵循的依据。在战略特点方面,乡村振兴的特点是循序渐进、层层推进、久久为功。不理解战略的特点,可能带来简单化、粗浅化、表面化的政策落实,用“规模化经营”代替“产业兴旺”,用“一窝蜂”推进、“一刀切”实施代替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特点是顶层设计与地方规划相结合,是全局要求与实际情况相适应,而不是“速战速决”“立竿见影”、快速完成短期项目或追求政绩指标。

王、刘:您提出“人才问题是乡村振兴的元问题”。一直倡导要关注乡村振兴中“人”的作用,那么请问您认为应如何优化我国农村人力资源配置,吸引人才返回农村?

雷:目前普遍存在的村庄空心化问题、乡村凋敝问题、外出务工问题、返乡问题、城镇化问题,包括大家经常谈论的土豪称谓出现的问题,我认为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是精神、能力、机会、信心问题,是国民素质问题,是如何实现自然小农人走向现代社会人问题。可以说,人的问题就是乡村振兴的根本性问题,是元问题。

对于人的问题,其根本我认为是城乡二元结构强加在农民身上的枷锁,长期以来以身份而不是以职业来识别对待农民的歧视性做法。只要一说到农民,社会上有些人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同乡下人、农村人划一个等号。这本身就是一种歧视,一种不平等。必须将农民同其他产业从业人员一样,由身份地位改为职业定位,彻底斩断二元结构给乡村带来弊端的源头,才能真正实现城乡同位的问题,真正实现公平公正的振兴发展。

由能力贫困理论可知,机会的缺失、疾病、糟糕的教育水平、社会保障系统的软弱无力等是造成人们收入能力丧失并陷入贫困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但在市场经济中,能力不仅仅是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更应该是持续性发展能力。能力和机会不仅需要具有,而且还都需要具有竞争力;能力和机会不是外界给的恩惠,更是自己去积累、去抓、去形成和提升的。同时,从可持续发展来看,在现代社会中,仅有自身发展能力显然是不够的,也是有缺陷的,还应同时具备维护和保护其他人特别是下代人福祉的意识和能力,即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能力如何提升?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学习。现实实践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在实践中学,干中学,这对广大农户特别是脱贫农户而言,才是一条可行可用持久耐用的有效之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在以往具体实践中,由于“授渔”周期较长,脱贫成效“迟缓”,再加上受社会上“生存方式快餐化、生产方式复制型、思维方式即兴式”的影响,一些急于制造政绩的地方政府无意实施能力扶持,而一些“早晨栽树晚上就想乘凉”的农户特别是脱贫农户也无心参与这种方式。因此,未来还应继续大力推动“参与式”模式,引导农户特别是脱贫农户“在学中干,在干中学”,让他们通过自我可持续能力的提升实现振兴。近年在一些地方开展的,以引导并教会大家自己管理资金,自己负责相关项目的申报、决策、实施、管理及监督为目的“社区主导型”模式,就极大提高了农户特别是脱贫农户自我组织、管理、发展和监督的能力。

未来乡村振兴还会有不少的弱势群体,其陷入弱势地位的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劳动能力,而是就业权力的丧失或缺乏新的就业机会。因此说,创造就业机会,开展职业化岗位培训,实施就业振兴,同样是未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而关键的任务。为此,应加大由目前短期的引导性培训延伸到中长期培训以及导向性务工就业培训的转变,最终实现终生学习机制。同时,还要注重培训和转移的指向性,按照“富教

合一”“学以致用”的原则,围绕“让农民当好农民、让农民兼当农民、让农民不当农民”的职业定位,把来自不同渠道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项目和劳务输出、劳动力流动整合归类,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根据不同的职业定位进行不同的“对口培训”及转移就业。

另外,从以往经验来看,相对于能力而言,制度性能力缺失同样十分关键。落伍掉队可能源于没有机会,没有机会源于体制机制设计得不合理。当落伍掉队成为体制机制设计缺憾的牺牲品时,弱势群体能力提升和摆脱落伍掉队境地的机会就变得更少。因此,未来乡村振兴还应继续从最大程度上避免历史上反复出现“制度性能力缺失”的悲剧,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创新及时有效地对不合理的体制机制进行“纠错”和改进,并通过相关制度安排和制度激励,如制定和颁布《可持续能力提升法》《国民素质提升法》等法律,从法律层面来保障形成具体有效的能力补偿和保障措施。

王、刘:可持续发展理论主要涵盖四大主题:保护自然资源,保持经济的理性增长,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努力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最优关系。如何理解可持续发展理论视域下的乡村振兴?

雷:可持续发展理论视域下的乡村振兴,就是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保护自然资源,保持经济的理性增长,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努力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最优关系”四大主题,持续深入地纵深推进生态乡村建设,推进农业和农村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目前这一任务还很艰巨、压力还很大。因此,为进一步又好又快地推进生态乡村建设工作,推进农业和农村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的生态环境困难,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信心不动摇,加大力度不松劲,找准短板补不足,强化保障不弱化。时刻牢记要“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活环

境”。建设“和美乡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既要“生态美”也要“百姓富”,既要美丽生态也要美丽经济。具体来说,要注意紧抓以下几点:

一是牢牢树立生命共同体意识。地球是我们的家园,山水林草湖草沙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命共同体,必须固牢这一意识,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并时刻以人与生态生命共同体意识为指导,推动乡村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促进生态乡村建设,确保美丽中国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现。

二是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坚持以“两山”理念为指导,立足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充分利用山水、田园、人文等资源优势,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乡村旅游、农家乐、民宿、电商、物业等,壮大村级经济,依托自然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培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新动能,探索形成“生态+”复合型经济发展模式,做强做大“生态经济蛋糕”,助力乡村振兴,努力实现“生态美、百姓富”。

三是全面优化生态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乡村发展的宝贵财富和最大优势。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着力提高生态乡村建设品位。生态景观带的串点成线,既要顾及交通的可通达性,更要考虑景观带的主题性,做到精益求精。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为抓手,推动建设生产、生活、生态和谐共生的美丽乡村,进一步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四是扎实做好“两山”的科学转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需要科学的转化方式。生态乡村建设过程中,践行“两山”理念,乡村需要对本地区的特色资源环境、乡村的区位优势、当地产业环境和基础,以及目标人群的消费市场变化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合理化挖掘。一方面,要着重开发依托当地生态环境衍生或延伸的相关产业发展,拓宽发展思路,探索发展“绿水青山”的内生性产业。另一方面,则要转换“绿水青山”的营销理念,打造产地市场,将产地转变为销地,提高“绿水青山”原产地农产品附加值。

王、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关于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历程的起点上,如何理解这种新的收入分配制度?

雷: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新阶段发展的主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十四五”规划提出: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发挥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再次提到三次分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历程的起点上,可以说,收入分配与再分配,以及再再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之路。

按照传统三次收入分配理论,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基础上,三次分配是指所有自然人、法人或社会团

体自愿捐赠一部分收入的行为,也即所有的社会捐赠行为。再分配是对初次分配的补充,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三次分配是在市场和政府双失灵的情况下,对国民财富进行的又一次分配。在以社会捐赠为主要内容的三次分配中,相当一部分的资源直接投入公益慈善事业当中。公益慈善组织被称为区别于市场和政府的三部门,对包括低收入者在内的弱势群体具有天生的关注与关怀,并且公益慈善组织信息灵敏、行动灵活的特点,使其能够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双失灵的地带中发挥作用。

基于长期脱贫攻坚实践,这里我们提出四次分配概念,所谓四次分配是在我国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工作中出现的特色分配环节,指针对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户,将部分补贴从以往的无偿给予变为现在的有偿发放,将补贴、补助变为奖金、工资,鼓励有能力的低收入户通过提供劳务来获得这部分收入。

四次分配与前三次分配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区别,可视为前三次分配的混合。从分配原则来看,市场机制在初次分配中发挥主导作用,在四次分配中低收入劳动力虽然同样需要将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环节中才可获得收入,但四次分配中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向低收入劳动力倾斜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具有鲜明的公益性。从分配对象来看,初次分配的分配对象为生产过程产生的国民总收入,而四次分配的分配对象则为各类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资金、涉农资金或村集体资产。与政府主导的再分配和社会力量主导的三次分配相比,四次分配的资金虽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政府财政支出和社会捐款,但再分配、三次分配与四次分配的运作方式显著不同。再分配、三次分配中低收入者无偿获得收入,在四次分配中则不然。四次分配鼓励低收入户付出劳动来换取福利,又保护低收入户免受竞争市场的不确定性影响。四次分配在为低收入者提供保障的同时,又避免助长“等、靠、要”的思想,既考虑到了低收入人口的实际困难情况,又有助于提高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资金的使用效率,激发低收入者内生的脱贫动力,是我国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工作转向可持续发展方向的表现。设立公益性岗位是四次分配的常见做法,脱贫攻坚过程中,公益性岗位被用于安置就业困难的贫困劳动力,以往无偿发放的补贴则变成就业者的工资和奖金。

针对经济增长与提升全体国民整体生活水平的关系,以及初次分配环节的基础地位、再分配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重要作用、三次分配对市场与政府双失灵的有效弥补、四次分配独特的优越性,我认为应当充分重视收入分配对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今后应加快构建以初次分配为基础、以再分配为重要补充、充分发挥三次和四次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推动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政策从以促进收入增长的开发式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向促进收入增长缩小收入差距和强化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护式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开发式和保护式并重模式转变。

王、刘:城乡二元结构反映了城乡在生产及生活等层面的不均衡、不对称状态,其对乡村发展的阻碍性比较明显。在当前“共同富裕”战略下应当如何破除这种城乡二元结构?

雷:城乡二元结构反映了城乡在生产及生活等层面的不均衡、不对称的状态,其对乡村发展的阻碍性比较明显。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走过了以农助工、乡村支持城市到以工哺农、城市反哺乡村,到现在工农呈现交叉、城市乡村呈现互容的发展阶段,不过不管哪个阶段,尽管目前已有不少的城乡融合,但二元结构的边界特征依然存在,城乡两体互立、两张皮的结构特点依然突显,成为乡村振兴、城乡统筹的一个新情况抑或说是一个必须跨过的坎儿,面对新阶段、新任务,现在是时候真正解决这一问题。

目前看,一个关键就是要充分发挥城市作用,离开了城乡,离开了二产、三产,只是就乡村而乡村,就农业而农业是不行的。乡村振兴的强大引擎还是要靠城市,要靠二产、三产、新型产业业态,更是要靠城市的人财物各类要素,特别是要靠城市巨大市场的推拉融合来实现。现在最为重要的是要尽快真正地形成两体合体,形成双头一体的双头鹰模式,这就是我们这里提出的,要以“城乡连体共生”为抓手,真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特别对于一些大城市、超大城市,集城与乡于一体、传统与现代于一身,具备“大都市、大城区”“大城市、大近郊”空间特点的大都市。

这里所谓“城乡连体共生”,其实质就是以共生形态,打造城乡共同体。按照功能分区定位,包括产业功能,区位功能,生活功能,文化功能,生态功能如城市农业、城市花园定位,通过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联动,城乡融合,城乡共生,突破现有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二元结构再造,进而实现“村(社区)-乡镇-区(县)-省市”连体共生,城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新型乡村关系,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

具体来说,就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切实统筹新型城镇化,以县区为核心,市-县区-乡镇-村社区“四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建设“三生兼顾”,农业、工商业、服务业、旅游/文化、数字/智慧、生态“六产融

合”,通过建立健全有效的全员利益联结机制,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激励约束机制,切实将所有农民均涵盖在内,农村产业生活均牵涉其中,农村三产业、六产业发展均有考虑,形成城乡全(多)元主体、全要素参与,开放灵动,相互依存,协作共生生态,促进农业、农民、农村发展“三体共进”,城乡产业发展圈、城乡休闲旅游圈、城乡社区生活圈、城乡社会治理圈“四圈齐驱”。

王、刘:您致力学术研究多年,作为一名资深的学者,您对从事学术研究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雷:我做社会学研究是从环保和扶贫开始的,研究与实践工作已有二十多年,到过许多地区、县乡、村寨,其中一位老奶奶的话,让我终生难忘。那是1993年,当时我还是一个理想的环保主义者,对有害环境的行为深恶痛绝。有一次我们到南方一个小山村考察,那里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老百姓却生活贫困。记得刚到那儿不久,我们就在路边不远的地方,看到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奶奶,佝偻着背,守着一个炼锌炉。要知道,没有经过环保处理的冶炼,污染特别大。随行的乡镇领导对老奶奶说:“阿婆,你赶快收了吧,现在不能再这么做了。”“是啊,您这样对环境污染太大了。”我也跟着说了句。老人护着那个炉子,对我们说:“不能收啊,我们全家就靠这炉子吃饭了。我以后都把炉子放在我家屋里头,关上门,不污染别人,就污染我自己,行吗?”老奶奶的话让我们几个北京来的年轻人心里都很难受……当地干部说:“我们是手捧金饭碗要饭吃!你们是专家,帮忙想想办法吧!”

由此我开始反思,贫困群体的聚集地,很多都是在生态脆弱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环保的目的是为什么?金饭碗怎么才能吃饱饭?从存活到可持续,路在何方?在后来的工作中,我多了一份思考。2005年,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成立,这是全国高校中第一个专门研究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机构。我主动要求从光华管理学院来到了这里,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我们首先选择了西部最困难地区开展扶贫调研。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毕节则是贵州脱贫攻坚的“娄山关”。经过深入调研,我们创立出“山顶戴帽子,山腰系带子,坡地铺毯子,大田种谷子,山下抓票子”的“五子登科”模式。也就是山顶植树造林,山腰造生物墙,坡地种草,基本农田种粮食,山下开展多种经营。这个模式的实施,很快让毕节在水土流失的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最重要的是,老百姓得到了真实惠。以我们的调研报告为背景完成的《毕节宣言》,也成了毕节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减贫的重要指南。进入新时代,毕节广大干部群众以此为指导,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又创造出了“产业就业、生态保护、易地搬迁、教育培训、科技引智”的新“五子登科”模式,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高校是知识型人才的集聚地,帮扶贫困群体是我们必然的社会责任。我们院的老师们来自全校各个学院,不求名、不求利,自带经费干粮,带领学生们深入田间地头、进村入户,建言献策,将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调研中我们克服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一次我们在云南昭通镇雄大山上,突然遇到大雾,打开大灯也看不到半米,我们小心翼翼、摸索前行。突然轰隆一声,一块大石头,就落在了离车不到一米的地方,全车人都大声惊叫起来,就连有着二十多年汽车兵经历的老司机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现在说起这事,我还会感到后怕。但当看到曾经帮助过的地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贫困的老百姓脸上露出的笑容时,我们很欣慰,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目前,我们已深入全国十四个贫困片区200多个地市县开展扶贫实地调研,完成近百份调研报告;连续成功举办七届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先后发布《昭通宣言》《滨海宣言》等七份重要宣言,倡导和推进可持续减贫。我们的扶贫专著《中国扶贫》荣获中国好书榜第一名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一等奖,并被翻译成多个语种向全世界发行。我本人也当选为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和北京市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2020年11月21日和23日,随着甘肃省、贵州省这两个脱贫攻坚主战场相继宣布各自省内剩余贫困县全部清零,全国22个省的贫困县实现了全部脱贫摘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一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在这场战斗中,中国人民上下同心、尽锐出战,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令世界瞩目。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设立5年衔接过渡期,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推动“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国家乡村振兴局成立,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在2021年更名为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作为一名学者,我将带领团队继续前行,为人民富足的幸福中国,将论文扎扎实实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责任编辑:栗红蕾]

[助理编辑:刘晴晴]